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切斯特顿 随笔选

[英] G.K.切斯特顿 著

沙铭瑶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切斯特顿

随 笔 选

〔英〕G.K.切斯特顿 著

沙铭瑶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切斯特顿随笔选/ (英) 切斯特顿 (Chesterton, G. K.) 著; 沙铭瑶译. —2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BN 7-5306-3141-1

I. 切... II. ①切... ②沙... III. 散文—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05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3.8 元

内 容 提 要

切斯特顿是英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博学大师,他思想深邃,视野宏阔,文笔机俏,风格奇异,长于寻常琐事中发惊世之绝响,回味之余,令人赞叹。

本书精选了切斯特顿不同时期的散文代表作 40 篇,基本反映了其想象丰富、诡谲峻拔的艺术风貌。

目 录

谈侦探小说	(1)
谈广播	(6)
谈电影	(11)
谈英国人在国外	(16)
谈戴枷示众	(21)
谈感伤	(25)
谈误解	(31)
谈殡葬习俗	(37)
谈悠闲	(43)
谈荷兰	(48)
谈考古学	(53)
谈滥用词语	(58)
谈恶劣的委婉语	(63)
谈寻求快乐	(68)

谈圣诞节	(73)
谈喜剧精神	(78)
谈趣味的变化	(83)
谈美国人的道德	(88)
谈禁酒	(94)
谈绝对戒酒	(99)
谈现代作家与家庭制度	(104)
谈追赶自己的帽子	(116)
谈躺在床上	(121)
为轻率的誓言辩护	(125)
为骷髅辩护	(132)
为公开宣扬辩护	(137)
为陶瓷牧羊女辩护	(142)
为丑陋事物辩护	(147)
为闹剧辩护	(152)
为侦探小说辩护	(158)
关于成功的谬论	(162)
神话故事的哲理	(169)
园丁与金币	(171)
傻子	(176)
雨中浪漫情调	(181)
完美的游戏	(185)
我在衣袋里发现了什么	(190)
一枝粉笔	(194)
再谈圣诞节	(199)

圣诞节礼物 (204)

译后记 (206)

谈侦探小说

卡罗琳·韦尔斯夫人是位曾发表过很多极佳的谋杀小说和神秘故事的美国女士。自从她向杂志提出，抱怨这种书籍所遭遇的令人不能满意的批评以来，到如今已有好些年了，可是责骂之声仍未得到纠正。她说，非常明显，评论侦探小说的任务交给了那些不喜欢侦探小说的评论家了。她说——我想不无道理——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诗集并不送交讨厌诗歌的评论家；普通小说也不由严厉的、视一切小说为不道德的道德家来评论。假如神秘小说也有权得到评论的话，那它就有权由懂得为什么写这种小说的人来评论。这位女士还继续说，由于受到这样的忽视，这类故事所真正需要的技巧性便从未充分加以讨论过。就个人来说，我赞同她的意见：这是一个完全值得讨论的问题。没有什么文字比伟大的批评家专门探讨这一文学问题所写的评论片断更优越、而就真正的意义来说更严肃的了。例如，艾德加·爱伦·坡在那篇优美的田园牧歌开头对杀人的人猿的分析；或安德鲁·兰^①对埃德温·德鲁德案件的研究；或史蒂文生在《沉船》末尾对警察小说发表的议论。这样

^① 安德鲁·兰（Andrew Lang，1844—1912）：英国学者、诗人、荷马专家及翻译家，以写童话故事和翻译荷马史诗著称。

的讨论，如有明确的引导，就会马上证明这种艺术形式所包含的艺术规律跟任何其他艺术同样繁多；这种形式人们能欣赏，但不能评论，这说明他们并不是反对它。对任何一首优美的歌曲或任何一部合理的传奇，情况也是如此。由于一种奇怪的糊涂思想，许多现代批评家原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杰作也许不能流行，而现在已转变为另一种看法，认为除非它不能流行，否则就不可能是杰作。这就仿佛等于说，一个聪明人因为说话时可能有语言障碍，所以除非他口吃，否则就不可能是聪明人。凡是不流行也就是默默无闻；凡是默默无闻就像口吃的人一样是一种表达上的缺陷，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流行一边的；我对一切种类的耸人听闻的小说，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都感兴趣，而且乐于讨论它，尽管我的解释远不如那位《维姬·范》的作者。假如有人愿意说我的趣味又庸俗、又无艺术、又无文化，那么我就只能说我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跟坡一样庸俗，跟史蒂文生一样无艺术，跟安德鲁·兰一样无文化。

且说，更加奇怪的是这种故事的技巧没有得到讨论，因为正是在这种小说里，技巧几乎就是窍门的全部所在。更加稀奇的是写这种小说的作者没有得到批评方面的指导，因为它是少数几种这样的艺术形式之一，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获得指导的。而更加离奇的是没有人讨论创作规律，因为它属于少有的情况之一，某些规律是可以确定下来的。这种写作不属于最高层次的创作，这个事实倒使人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结构问题来对待处理。可是人们一方面愿意教导诗人要有想像力，而一方面又似乎认为，在纯粹是巧妙这样的问题上要协助情节策划者倒是毫无希望的

事。有教导人们写作十四行诗的教科书，仿佛这样的幻想，如光秃秃的枯枝上原先有可爱的小鸟在歌唱，或者一堆希望的枯叶在地上旋转不停，大风扇动着死亡的不可摧毁的翅膀。这些像魔术手法都是可以加以解释的。我们有阐述短篇小说艺术的专著，仿佛《厄舍古屋》中层层加深的恐怖，或《弗朗查德的宝藏》中活泼泼的讽刺都是食谱中的现成做法。可是说到这种唯一的、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运用严密的逻辑规律的小说，看来还没有人对这些规律的运用操心费神呢。没有人写这样一本简单的书，它也是我天天在书摊上希望见到的书，那书名就是《如何写侦探小说》。

我本人迄今为止只发现了不能如何写的方面。不过，就是从我自己的失败当中，我也瞥见了一些零零星星的苗头，可以提出这样一些简要的忠告。有一条首先的原则，我对它深信不疑。一篇耸人听闻的故事，其全部关键就在于秘密应当简单。整个故事存在于令人惊奇的片刻之中；而且应该是片刻。它不应该是这样的故事，需花费20分钟来解释，还要花费24小时来记住，以免把它忘却。检验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心里把这样戏剧性时刻的情景想象一番。想象在黄昏时分一个黑森森的花园，远处有个可怕的声音在呼叫，而且沿着蜿蜒的花园小径愈来愈近；直到可怕的说话声听得很清楚；喊叫声出自故事中某个不吉祥但又熟悉的人物口中，一个陌生人或仆人，从他口中我们下意识地预期着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大暴露。那么，很明显，他发出的那声呼叫必定是很短促而内容很简单的话，如“管家是他的父亲”，或“副主教是杀人的比尔”，或“皇帝割断了喉咙”，如此等等。可是太多的、在其他方面有独创性的传奇作者似乎认为，他们的责任是发现一系列最复杂和

最不可能的事件，并且能把它们结合起来以便产生出某种效果。效果可能合乎逻辑，但并不能耸人听闻。仆人不可能用这样的尖声喊叫来打破黄昏时花园的寂静：“皇帝的喉咙被割断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皇帝陛下正在亲自刮脸，刮到一半便睡着了，他因操持国家大事实是疲惫不堪；副主教起先原想本着基督教精神替酣睡中的皇上完成刮脸的动作，这时突然萌发了谋杀的念头，因为他记起了那个政教分离法案，可是刚划了一刀又后悔不已，马上把剃刀甩在地板上；忠实的管家听见了声响，一下子冲进来，把武器抓在手里，但由于一时慌乱误把皇帝的喉咙当作副主教的喉咙割断了；对此谋杀案青年人和姑娘不再相互猜疑，于是他俩结为伉俪。”要知道，这个解释，不论多么合理和完整，并不能很方便地作为惊叹表达出来，也不能像最后审判日的号角那样突然在黄昏笼罩下的花园里吹响起来。谁愿意实验一下，在黄昏时分跑到自己家的花园里去把上面那段话高声喊出来，他就会明白这里所指的困难所在了。这恰恰是这本小教科书要多多列举，并用图解方式加以说明的那些技巧方面的小实验之一。

另一条真理，这本小教科书至少暂时会采纳，那就是“警察小说”应以短篇、而不应以长篇小说作为范本。有一些名著例外：《月亮宝石》^①和加博里约^②的一两本著作是，这种类型的伟大作品，正如我们当代本特利先生的《特伦特的最后案件》和米尔恩先生的《红屋秘事》一样。可是

① 英国作家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的作品。

② 加博里约（Emil Gaboriau，1832—1837）：法国作家，被称为法国侦探小说之父，主要作品有《勒鲁日案件》、《勒考克先生》等。

我认为长篇侦探小说的困难倒是真正的困难，尽管极聪明的作者能用各种办法加以克服。主要的困难在于，侦探小说毕竟是假面具的、而不是真面目的戏剧，它取决于人物的假性格，而不是真性格。不到最后一章，作者不可能把那些最有趣的人物的任何最有趣的事情告诉我们。这是一场蒙面舞会，其中每个人都佯装成另一个人，而且不到时钟敲响12点，他们本人是不会引起真正的兴趣的。这就是说，如我刚才所讲的，不读到最后一章，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明白人物的心理和哲学、道德和宗教。因此，我认为最好是让第一章同时也是最后一章。短篇小说的长度大约是这样一个合理的长度，正好让这幕充满事实被误解的特别戏演完为止。无论如何，至今还没有比那些老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连续故事更好的侦探小说；虽然这位魔术大师的名声已传遍世界各地，而且成为现代社会所创造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伟大传奇人物，但我认为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却并未因此而获得足够的感谢。作为千百万读者之一，我要向他表示我的微小的敬意。

谈广播

关于广播问题的反复讨论，包含着一些道理和许多毫无道理，范围涉及对老人和病人带来安慰的可敬佩的好作用，直到高谈什么收听演出这种荒诞的妄想，因为演出显然是为了眼睛看，而不是为了耳朵听的。报上宣布：“请收听轮船下水的实况”，那它也满可以谈论：“请闻闻著名的雕像，或吃吃交响乐，或用显微镜观察一下寂静”。收听伴随着盛大演出的那么一点点模糊而偶尔的音响，必然会令人如此满意，正像闭着眼睛去闻皇家艺术馆所有的油画一样。另一方面，那个较谦逊的借口倒是一个完全正当而满有道理的借口。利用广播可以给那些因为年龄和病痛而日常生活受拖累的人们带来快乐，这的确是真的；带来这种快乐的义务远远不是现代科学的时尚，而应该看作古代人类慈善机构的一个分支。它属于这样一种精神，该精神非常崇高地记载在世界上最古的典籍之一当中：“我是盲人的，眼睛，跛子的双脚”；而生活在那种宗教传统下，没有人会说一个字来反对它。

然而，我倾向于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会把这种事看作通常为非健康人着想的事。做“跛子的双脚”，这是件好事，意思是指向那些不能走路的人提供木脚和拐杖。可是假如我们对熟人当中任何一位从事运动的青年人也庄重地

向他赠送一只木脚，那他很可能会把这事看作侮辱，要是他不看作开玩笑的话。他肯定不会把这事看作科学进展的下一步，从而他也应当装饰着三只脚到处活动。做“盲人的眼睛”，这是件好事，意思是指向近视的人提供眼镜，或者可能提供望远镜。可是坚持要目力完好而锐利的美貌小姐戴上宽大的护目镜，或向她提供望远镜以便她在照镜子时瞧瞧自己，这就不那么得体了。关于所有这些支持和特别协助我们身体器官的东西，我们允许科学来弥补缺陷，而不是必然有缺陷，缺陷并不在那里。一个健康的社会可能明白，凡是对我们身体器官是正确的东西，对我们身体感官也同样是正确的。从事运动的青年人坐在家里收听音乐会而他只要走到街上便能找到音乐会，那他确实应当感到惭愧。他在家只能欣赏戏剧的一半而一走出房门便能欣赏到完整的全剧，那他就更应该感到惭愧。假如这种人只在比赛场上袖手旁观，他们往往会受到批评。假如他们连袖手旁观的运动精神也不够而只能收听广播，他们就确实应该受到更多的批评。

我在别处曾说过，我自己的社会理想是要接纳许多事物作为次要的好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其他社会制度只能作为最好的东西来提供。正如我们因为不能给人以土地便给他以股票，我们也因为不能给人以步行便给他以收音机。这种变化包含着对现代机器的崇拜态度有所改变；而且在跟更加奇妙的人的身心相比之下，也承认机器确乎是次要的东西。可是对这门电子科学来说，它竟承担着医疗科学的好心肠的角色，或者例外的病人竟要由物理学家像医生那样来治疗，这也不是丢脸的事。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束缚和压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

写乌托邦小说的缘故，而如今几乎所有写过一点东西的不道德的人们往往要这样做。依我看，乌托邦似乎总是意味着统治而不是解放；压制而不是扩展。它通常称为共和国，而始终是君主国。它是在这个词的古老而确切的意义上的君主国，因为它确实是被一个人统治，那就是书的作者。他可能告诉我们书中所有的人物都自发地享受着美好的社会现状；不过，不知怎样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他的理想世界总是他所需要的世界，而不是世人所需要的世界。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在书中它是多么民主，只要在实践中通过法律开始接近它，它始终是非常专制的。通向乌托邦境地的首批现代举措，通常都像禁酒一样是强制性的。那些举措，我已经说过，是专制的，因为整个方案就是专制的。它是专制的，因为它是幻梦；而一个人在梦境中往往是孤独的。我们称为乌托邦的一切不过是“假如我是国王”这种自然的、幼稚的、浪漫的情绪获得一种躲躲闪闪、含糊其词的表达而已。

因此，无论我多么愿意向广播员和那些畏缩臣民中其他许多人说明我若是国王就要干什么，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并非国王。我并不认真地强制实施我在此问题上所提出的社会安排方面的建议；所以广播员可以安下心来。百万富翁、科学家、机器专家也可以再鼓起勇气；因为我已决定让他们活下去。可是，既然当今十分流行的风尚是心里产生一个念头，于是就把它描绘成一项社会政策，那我看不出为什么不提出这样一个念头，我相信它比大多数念头都要合理得多。我要建议，一个真正健全的社会不要再进一步扩大那些业已扩大的通讯方式，而要对它们加以限制。要限制它们只用于那些真正离不开它们的人。要拒绝用于

那些没有它们反而过得真正更好的人；即使那些人只因为能练习在大路上步行而觉得更好些也罢。假如他们不愿劳神费力跑去听他们喜爱的公众演说家的讲演，那么我就真的不能明白为什么那些公众演说家竟不到他们那里去。当然他不是真正要去他们那里，去那里的只是他那称为声音的一小部分，很多政客倒会因此而更安全呢，因为没有人能看见他那张丑脸或批评他那浅薄而不老实的态度。反对收听实况广播的原因在于，无论你的欲望多么深切而认真，你也不能把那政客撕成碎块。可是在任何情况下，谁也不能期望老年人和体弱者参加到把他撕成碎块的这项年轻人的快乐游戏中来。对医院里的病人或坐在炉火旁的老太婆来说，那不是一项合适的游戏；假如他们高兴地怀着美丽的幻想，以为收听政客的讲演就会学到一点政治，那为什么不让他们怀抱着天真的梦想呢？至于较有知识的病人，较有头脑的老太婆，他们希望收听好音乐，或甚至坏音乐，那么他们显然可以提出要求，请一切信奉基督教的人对他们的孤立无助给予支援。

假如禁酒主义者要求凭医疗证书喝白兰地，那么为什么不要求凭医疗证书收听广播呢？假如一个人必须证明他有特许证，并有合法的理由可以进口大量的毒品，那么他为什么不该举出理由为何要把空中长串的话语都拖走，只由于他太懒，不愿走出去听？假如这种强制性的集体主义确是我们的理想状况，难道警察不能停止把拐杖普遍浪费在那些并非跛子身上的做法？难道不能要求市民们做出一点努力，让城市里的艺术和艺术机构保留着它们的古老形式？对于音乐，我不敢说有什么特殊的理解，可是对于爱国主义却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女王音乐厅的音乐会失败了，

我觉得这对一个伟大的民族确是一桩肯定无疑的耻辱。我听说，人们之所以离开而不进去，是因为他们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音乐——天知道，那不一定是同样的音乐啊。我可不能相信女王音乐厅里所有的听众都得了麻痹症，或目前全是跛着一只脚的人们。假如他们认为艺术必然总是在最舒适的环境下才能欣赏，仿佛这样的环境才是最激发灵感的环境，我认为他们对整个艺术心理学的理解是错误的。一个人爬上山顶去看日出，他所看到的景色，跟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人看幻灯机放映的日出，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对坐在扶手椅上的人应该厚道些，因为他们不能离开那张椅子，可是我们却不应该认为，没有什么山峰是值得攀登的，或者没有什么剧院是值得光顾的。我记得甚至小时候上剧院去的一切快乐，而最大快乐之一不过是去那里而已。